

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

■高占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二字与“苗条”毫无关系。“好逑”的“好”念上声,不念去声!”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并非男女之间的誓言,而是男人之间的约定!”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并非表达思念之情,而是在说:两人一天不见,关系就已疏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个“伊人”,并非美女,而是姜太公的老翁!”

“《魏风·硕鼠》绝非奴隶逃亡诗歌,反而极有可能是晋国攻击魏国的宣传武器!”

……

当赵缺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诗经》的见解时,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惊呆了。幸好,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赵缺,否则,我也许会认为对方是在信口开河。

赵缺是我晚年最好的诗友。所谓最好,不仅是说他与我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也是说,他是我生平仅见的诗坛奇才。

翻开赵缺关于《诗经》译著、解析的稿件,我仔细品读、再三思索,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赵缺是正确的。他的论点都经过了严密的考证,有着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我以往对于《诗经》的理解,居然有许多地方都是错误的。

下面我就谈一下我对《诗经》中某些篇章的最新认识吧!

《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今人多半相信这首诗表现了君子想要追求淑女的意愿。然而,“君子”是指有威严、有德行的贵人。“逑”原指“怨偶”,西汉大儒毛亨将“逑”解释成“配偶”。古人一般很少自称君子,更不会爱上一个女孩,就说:“这姑娘是我的好配偶”。古代的《诗经》专家也不曾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爱情扯上关系。

毛亨以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指周文王的正妻太姒意图为丈夫寻求淑女做妾侍……这两句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那些文静贞贞、美丽贤惠的小妹,和我那仪表堂堂、品德高尚的夫君十分般配”。毛亨的观点,在今人看来似乎非常可笑,却也合乎时代背景。

不过,由于“好逑”的“逑”字原义是“怨偶”,解释成“配偶”有些牵强,所以赵缺并不同意毛亨的看法。赵缺反复研究,最终认定:《关雎》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草根(穷苦青年)。在上古时期,礼仅不曾完备,草根爱上淑女,还是有机会与淑女结合的。可是到了商末周初,等级制度日益森严,那淑女对于草根来说,也就像“河洲”中的“雎鸠”(鱼鹰)一样,能闻其声,而不能接近了。于是,草根不禁叹道:“那窈窕淑女,就算不爱君子,就算满怀怨气,也必须成为君子的佳偶!”然后,他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几句诗表达了苦恋之情。接着他又说:“只有琴瑟、钟鼓这些贵族专用的乐器,才能取悦淑女。”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相当于今人所说的“美丽、高贵的姑娘,的确应该坐

名车、住大房”。

《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今人时常引用的诗句,大家通常觉得这两句诗描写了夫妻之间的誓言,意思是“我要拉着你的手,和你相伴到老。”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解读。《毛诗正义》对于“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解释是:“战场之上,两个战士历尽艰辛,在生死之际,立下誓言:我们要互相扶助,活着离开战场,回到家乡,平安到老。”南宋大儒朱熹则认为,此诗描述的是战争之中战士突然想起家中的妻子,深深叹息自己不能再与爱人团聚。朱熹的说法,虽然很感人,其实却并不合理。首先,两人的誓言是在“死生契阔”的情况下订立的,当时的夫妻不太会共同面临生死的考验;其次,“子”是敬称,略似于现代的“先生、您”,通常指男子或者贵妇。上古时代,普通人在与妻子山盟海誓的时候不太可能称对方为“子”,所以,这个“子”应该是指男人。

赵缺说,男人与男人“执手、偕老”,这两个战士的关系大概有些暧昧。我是个保守的老人,听了这话也只能付诸一笑,不愿再作深入研究了。

《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

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今人多半觉得“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表达了男女的思念之情:一天不见,就像多日不见一般备受煎熬。这种看法其实是把后人的感觉强加在古人的身上。在《诗经》时代,人们认为快乐会使时间变长,而忧愁只会令时间变短,如《唐风·山有枢》、《小雅·白驹》都描绘了古人的这种感受。所以,《毛诗正义》指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真正意思是“一天不见,我们的关系就已经疏远,简直就像九个月不曾见面”(摘自赵缺译诗)。

按着赵缺的解释,这首诗是在描述男女偷欢之后,翻脸无情。《王风·采葛》出自东周王国,当时周天子无力监管民风。并且,王朝周边的国家郑国、卫国“淫风”极盛,王朝也难免受到影响,出现男女任意胡为的现象。

我不曾熟读东周历史,不了解那时河南的风气是否真的这么开放。不过,今后我再也不会向着老伴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了。

《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曲。
这“伊人”究竟是谁?赵缺明确

指出:“所谓伊人”,并非女子,而是西周名臣、垂钓渭水的姜太公,以及与姜太公年龄接近的贤士鬻叔、百里奚。

《蒹葭》不是爱情诗。秦国是民风朴实的国家,秦国的女子不会飘然水上,等待男子的追求。东汉大儒郑玄觉得《蒹葭》是一首求贤诗,诗人意在劝说秦国君主能够访求精通周礼的贤士。

赵缺认为:秦国位于西周故地,邻近西戎,时常处于战争状态,秦国最需要的“伊人”是神机妙算的智者,而不是精通周礼的贤士。秦国的主要河流就是渭水,渭水岸边就是周文王遇见姜太公的地方。秦人在艰苦的战争时代,最希望得到的人才应该是姜太公式的人物。并且,“蒹葭”是初生的芦荻,虽然青翠,却毫无用处。只有经历了风霜的考验,芦荻才会坚实中用。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思其实类似于“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看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两句诗可以视作是对我们这些老年人的鼓励。

《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汝,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三岁贯汝,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以前,我一直相信《魏风·硕鼠》是一首奴隶逃亡诗,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一说法存在着不

少漏洞。

首先,奴隶是世代相传的,奴隶的孩子从小开始就受到奴隶主的压迫、剥削。因此,一个能作诗歌的成年奴隶,不会向着主人说“三岁贯汝”(我侍奉了你三年)。“三岁”指的是三年左右,古人从来都没有将十年以上的岁月称为“三岁”。

其次,周礼规定,人民有合法迁徙的权利。当然,这个“人民”指的是自由民。自由民无须逃亡,而真正的奴隶即使准备逃亡,也不太可能作一首诗传得街知巷闻,令统治阶级产生防备之心。

再次,《硕鼠》出自《魏风》,魏国是极其弱小的国家,统治者崇尚节俭、热爱劳动。在这个小国,奴隶主疯狂压榨奴隶的几率并不大。

赵缺怀疑《魏风·硕鼠》是晋国人用来打击魏国的政治武器。晋国奸细混入魏国,散布民歌、分化民心,降低魏君的威信,最终,晋国的确轻而易举地消灭了魏国。并且,在整部《诗经》中极少存在臣民辱骂国君的诗歌。将一国之君比喻成畜生,而且是最卑贱的畜生“硕鼠”,这么激烈的言辞更是不可能出自政敌的口吻。

赵缺的说法极具颠覆性。我细细一想,却又觉得十分可信。我不禁想到:当今社会的某些文人不断地编造言论、抹黑祖国。他们是真心爱国,还是有意卖国,这个我就不好判断了。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公仆绝不会像春秋时期的魏国贵族那般,在谣言的攻击下失去民心、一蹶不振。

以上观点多半来源于赵缺的著作。如果我的表达存在什么错误,还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中法哲学家眼中的“天人合一”

■本报特约记者 计亚男 整理

访谈嘉宾: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白乐桑(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法国地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Joel Bellassen)先生曾于1974年到197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学,他与法国著名哲学家巴蒂欧(Badiou)于1978年在巴黎合作出版了《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根据张世英先生的一本书》。白乐桑于2012年9月来华时到张宅作客,与张世英先生就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情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和差异问题畅谈已见。

白乐桑:我最想送给张先生的一本书是——《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根据张世英先生的一本书》,这是1978年在巴黎出版的我的著作。到如今在法国还有人议论这本书。其中,我写了一个序,关于在中国研究黑格尔的状况。巴蒂欧先生也写了一个序,关于在欧洲研究黑格尔的情况,我翻译了张先生的一些选段,大部分内容是巴蒂欧先生发表的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还有他对张先生观点的一些论述。

张世英:我有一套关于中西文化哲学的看法,其中特别涉及到法国。就西方文化来讲,有现代、现代,而现在大家用的最热的是后现代这个名词,它主要是指黑格尔去世之后至今这一时段。后现代思想、后现代哲学、后现代的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绘画,都离不开法国人的贡献。

整个世界的文化潮流向什么方向发展?这要从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和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说起。我以为,总的发展趋势是中西文化要互补。

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比中国早了几百年,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启蒙运动就是个性大解放。在这一点上西方比中国早了几百年,可以说中国的个性解放在步伐和速度上都慢了半拍。

从十五世纪开始,一直到黑格尔逝世,在这几百年里,西方思想的核心是什么?用西方语言来说,

其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我是主体,外面的是客体,我要认识和改造外面的客体,这是西方长期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少有这个思想。梁启超早就指出过,中国人不重视认识和改造自然。中国人重视的是人事关系。

主体改造客体,第一是改造自然,第二是反封建,这是个体改造客体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的东西从形式上是没有了,但是从实质上,一直到现在还存有各种影响。但是,西方的主客二分,也有流弊,从黑格尔之后,受到后现代的批评。

先说海德格尔,他的哲学特点是批评主客二分,他不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他主张的是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他在法国很受人欣赏,比如萨特写的《存在与虚无》,就是解说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后来又出现一些法国画家,比如杜尚,他有禅宗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海德格尔对主客二分很不喜欢,杜尚也很强调主客合一,将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这些思想在法国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这是他们对传统思想中主客二分的一种批评,是经过主客二分那个阶段,然后提高了一步。好比是经过了一个“之”字型,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道路,表面上好像回到了与我们祖先倡导的天人合一一样,但是人家中间经过的主客二分,强调自我,强调民主,强调自然科学这一套东西,我们还没有达到,因此不能把杜尚的东西说成是我们中国早就有了。

为什么说中国人还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我们的天人合一是主客不分的,强调的都是不分彼此,不分人和物,不要把天和分得那么开,孔子、孟子、老庄都是讲这一套。中国的天人合一是原始的天人合一,法国后现代的天人合一是超越了主客二分之后达到的天人合一。这两个阶段不一样,应该承认我们慢了半拍。

所以,中国要学习西方的主客二分,强调有自我。不强调的话,一

天到晚自我受压制,自然科学怎么发展?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

拿破仑说过:“中国人是东方的睡狮。”这是他在哪个场合讲的?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使节受到冷落后去见拿破仑说,清朝太顽固了,居然拒绝跟我们通商,那我们就用洋枪大炮把他的门户打开,跟他做生意。拿破仑说,你别去做这事,中国是一个东方睡狮,它不过是睡着了,一醒来的话,它可要震惊世界!

为什么是个睡狮?
中国人爱讲我跟社会群体不可分,这是它的优点,大家群策群力而为之,表现出狮子般的威力。但是,自我被淹没在群体之中,我属于哪个等级群体,就说哪个等级群体的话,我属于哪个家族群体,就说哪个家族群体的话。这也就是所谓按社会身分说话,最终,自我被淹没其间。可是,伟大的科学理论创新,最终是靠个人的独立思维的。这也是中国自然科学理论比较薄弱的一环,原因就是自我没有解放,有自由,才有独立的自我,才有创造性。

然而,中国历史上,凡强调自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屈原强调独立自我,结果投汨罗江;司马迁强调独立自我,结果被阉割了。没有自我觉醒,中国的启蒙运动就很难。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

白乐桑:张先生讲得非常好,真是一种享受。我发现不少法国汉学家中,有不少是同时修汉语和哲学的,包括现在最有名的汉学家老前辈——80多岁的汪德迈教授,我最近去采访他时也问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一种好奇心态,相当于在学科之上的一种好奇的理念。

我一生中被动过最多的问题就是:您为什么学习汉语?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不容易。我也是在最近几年才找到答案——“我学习汉语的最根本的动机,是为了以后有人问我,您为什么学习汉语?”这一点儿不是文字游戏,换句话说

是为了学习疏远的东西。张先生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儿——“互补”。当年,我学汉语是那么年轻,完全是下意识的,没有想得那么远,是自然地愿意走向互补的境界——互补的语言体系、互补的思想体系、互补的文化体系。不仅是我,我们那一代学习汉语的人,大都是这样,因为在那时学汉语对就业没有一点帮助。我后来读过一些心理书籍,发现道理其实很简单。有甲乙两类人,第一类人,做每天习惯的事情,去熟悉的地方;第二类人,喜欢走向陌生的环境,做跟前一天不一样的事情。我属于后者。我学习汉语的最根本动机,是为了以后有人问我,您为什么学习汉语?这反映了什么、象征着什么?这就是差异。

我一直关注差异,包括现在,比如说中国饮食文化,正式场合官方宴请,我一面直接参与,另一方面作为旁观者。

张世英:中国传统文化现在需要什么?就是要个性解放,要学习西方后现代以前的主客二分,但是也要避免西方人的流弊——人类中心主义。法国人列维纳斯在他的书里谈到西方文化的缺点,说:西方的整个传统是自我专制主义,把自我看得太高了,是“自我专制主义”。所以他说要尊重他人。在这里,我要把列维纳斯的思想补充一下。真正尊重他人,要和自我联系起来。尊重他人,就是尊重他的自我。要承认我有自我,他人也有自我,不要老是想到我的尊严,我的自我,强调他人的自我,这就对孔子的爱人的思想作了一个大的发展。

我认为对于中国人的国学热,要分别看。有的人是真诚的,有的人是功力的。我强调要真诚地宣扬国学。白乐桑:请允许我用您的“热”这个词,我可能有保留意见,过去,我对“汉语热”的说法,也有保留意见。西方已经有好几个世纪对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感兴趣,法国在伏尔泰时代,贵族阶层已经形成了中国热,那时候办一个晚会,已经摆设很

多中国的家具瓷器等。

利玛窦应该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接着还有意大利的传教士。1814年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最早设有汉学教授席位,当时在其他国家还没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专程来巴黎听雷梦沙教授的课,这位法国人的一大爱好就是植物学,有一天,偶然的,他翻开《本草纲目》的一页,当然一个字儿都不懂,可是从那天起,他决定学习汉语,并说有一天我一定要读懂这个植物图。

这是为什么?雷梦沙作为一个西方人,中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挑战。对西方人来说,挑战非常重要。我19岁学习中文就是想让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看看我的探险,我想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学别人没学过的知识。我学汉语最重要的一点因素就是文化差异,其中就是文字的差异,不是拼音字母,不是拉丁字母,这正好是一种挑战。

我非常反感中国学术界经常议论的“中文难学”这一说法。问一个问题,数学界哪儿有议论数学难学的?没有,不会因为难学就会改变数学,所以我冒昧地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是心理问题。每门学问都难学,要看看您的兴趣,您的环境,您的需求等。

我认为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的DNA,远远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影响着中国文化,我们对中国国画很好奇,一幅山水画,有云,有山,有水,最下边有什么,要近点看,哦,有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小,我觉得奇怪,可能是整体观念吧,这就是天人合一。

中国文字对我们来讲就是表意,所以对我们有意思。如果我是一个文盲,我可能听说过黑格尔,能听懂,但因为没学过汉字,不知道这就是黑格尔三个字。每个语种或多或少在语言方面有些透明度,矛盾的是在语意方面。中文是全世界语言中语意方面透明度最高的,因为每个语素是单独的,不像法文里的语

素,如果没有学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就没法读懂语意,而中文是语素突出的语言,汉字包涵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基因,一个视觉很强的,相比其他文字视觉感最强的文字。

另一方面是一个字相对地是一个整体,难怪中国到处都有“福”字,国外哪有happy这样单独的词,happy就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象征,有的汉字“寿”、“■”,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象征功能。

所以国学对我们来说,比较好奇,和西方哲学不一样,没有形成体系,而且有时候是经过对话或者朴实的,正好因为这个,我们很难以定性,这显然不是文学,又不像哲学,说它是中国思想,但是有点像哲学,又与西方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确实不一样,是不是文字造成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点。

倒过来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出一个利玛窦?当然中国有郑和,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带着任务去?据我所知,最早去法国的中国人,叫沈福宗。很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信徒,跟着一个传教士去了法国,他甚至见过路易十四,而且当场表演了两件事:第一件,写毛笔字,在法国国王面前写毛笔字;第二件,表演了筷子,当时西方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两根小木棍。国王想了解中国,沈福宗说我们中国人是用筷子吃饭的,国王说筷子是什么?他就当场表演了。后来沈福宗坐船到伦敦去了,最后好像是在非洲病逝的。

到现在,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了,我经常跟中国大使馆有来往,但我发现中国人有时候不太会掌握对方怎么接受,中国文化怎么传播?这也是个主客关系,我冒昧地应用在这个例子上。

有时候在沟通方面,中国还不太会进行我和他的区分,所以有时候有障碍,或者说相对封闭。在行为方面上有主客方面的偏差。我觉得中西文化非常需要突出“互补”。